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源头 为什么说《乌托邦》是

□ 张源

政司法次官。在这个职位上，莫尔开始深度涉入参与英格兰的经济活动，曾受国王派遣两次出使国外，解决重大贸易纠纷。后来，他又担任过财政大臣、下院议长、英格兰大法官等。1535年，莫尔因拒绝承认亨利八世做英格兰教会领袖，被判处死刑。

莫尔生活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身处刀光剑影、杀伐纷争的宫廷，莫尔思考的却是人类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广博的见闻、丰富的知识、高尚的品格、跌宕的人生使莫尔得以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认识资本主义的贪婪，见证原始积累的残酷，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

写作《乌托邦》

《乌托邦》，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正是在这部著作中，莫尔完美展现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创造了一个概念——“乌托邦”，开创了一种思想传统——社会主义。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有两个希腊语词源，一个是 Outopos，指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有之乡”，另一个是 Eutopos，指人们理想中的“福地乐土”。所以乌托邦这个词本身也有双重含义。莫尔认为“乌托邦”虽然当下在世界上还不存在，但却代表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崇高理想。

《乌托邦》首先是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反映，是近代社会主义先驱反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最初呐喊。莫尔立足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社会和经济事实，对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其中最典型、最深刻的就是对“羊吃人”现象的批判。

莫尔最早意识到新时代的本质，显示了其思想的强大穿透力。在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部分地组织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阶段，他就意识到这种新兴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以及他们同政治的紧密关联，可能会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的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乃至政治运行方式产生重大、长期、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可能会产生新的奴役。莫尔认为，私有制是问题的根源。探究这种新的奴役的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是莫尔的重大贡献。

更超越同时代人的是莫尔的远大眼光——他大胆想象了替代方案，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莫尔的“乌托邦”中，人们过着吃饭不要钱、视金钱如粪土的生活。之所以能实现理想生活，基础在于制度设计。乌托邦实行公有制，以实现“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都富裕”。但莫尔设计的公有制不同于前人。前人往往强调财产共有、集体消费，而莫尔则将重心放在组织共同生产上。每个人都都要参加农业生产，除此之外每个人都擅长一门手工生产，相互补充，这样合起来，就能获得各种各样的产品、各种生活资料，能够满足人们各个方面的需要。

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才是共同消费。国家统一调配，家庭所需物品到仓库申领，住房每10年要调换一次，以防据为私有。城市和农村的居民也轮流交换，每年都有人结束乡村生活回到城市，又有城市居民来到农

村。没有穷人富人的差别，没有城市农村的差别。同时，每人每天只劳动6个小时。除了劳动，还有各种精神活动。每天黎明前，组织大家听讲座。每天晚餐后，是文化娱乐时间。乌托邦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开拓。

无论中西方文明，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想象自古就有。那么为什么说莫尔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首先，《乌托邦》不是针对一般的不合理社会现象的，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其次，《乌托邦》的社会制度设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是通过社会调控实现公平正义的。

莫尔的核心逻辑，他的实践与思想的主线，是一种关于秩序的想象——一种强烈的、系统的、将社会视为整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构想。要超越新生的资本主义所预设的世俗化个人主义的立场和方向，莫尔的方法是探寻遵循自然、人人互助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中，贪婪和罪恶皆无容身之所。正如乌托邦人都相信的：“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必喜欢珠宝的闪闪微光。”

历史局限性

莫尔以他所处时代最先进的思想为武器，利用了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地理大发现的最新成果，吸收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平等、公有观念，直面时代问题，深刻批判资本主义，提出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天才设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观念与实践。一位社会主义早期历史研究者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在初露端倪的时期，莫尔已洞见它的本质，以致他在头脑中所描绘出的和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损害而与之比较的那种对立的的生产方式，已经包含着不少近代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特征。

然而，遗憾的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历史局限性。他设想在农业社会形态中，在手工劳动基础上实现平均分配，消灭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有制社会，只能是空想。正如恩格斯所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在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乌托邦方案的局限不是莫尔个人的局限，而是历史的局限。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莫尔社会主义思想的空想性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伟大。其老友伊拉斯谟说：“我们大可以称莫尔为一切处于逆境中的人们的共同辩护士。扶助受压的人，使陷入迷惑困难的人得到解脱，为相互间有隔阂的人达成和解，莫尔认为能做到这些便是他的莫大收获。”社会主义在莫尔的美好期许中起航了。



德黑兰会议： 战后世界秩序轮廓初现

□ 唐健

戮力同心，共铸和平

线大幅度西进），但是提议签订一个针对德国的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斯大林同意了这一建议。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自己改变了苏联的东欧政策，但是斯大林的实际想法却是，这实际上“解放了我们的双手……我们边界的安全……将由力量决定”。

29日，莫洛托夫抵达华盛顿，罗斯福对于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态度积极，而且开始描述自己关于战后世界秩序的宏观构想以及苏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一，由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组成“四警察”确保国际社会实现持久和平；第二，邀请苏联参与瓦解传统殖民帝国，避免民族解放浪潮可能引发的“种族战争”这项伟大的事业。

但是随后，丘吉尔以准备尚不充分为由亲赴华盛顿劝说罗斯福放弃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想法，主张实施“火炬”行动，先扫除北非战场上的德意军队。8月，丘吉尔又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当面解释为什么要推迟横渡海峡与德国作战。斯大林对英美的决策感到愤怒，担忧他们正在借德国人的手消耗苏联的国力，“1942年6月，德国在苏联和芬兰部署了183个师的兵力，在北非只有3个。1942年夏秋时节苏军对德国造成的损失（26.9万人），是德国在其他地方加起来总和（4.4万）的6倍”。换言之，斯大林认为英美在法国登陆是尽快结束欧洲战争的唯一方式，除非他们想坐观苏德血腥厮杀。

虽然充满争吵，但是共同的敌人还是让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这次会面中达成了妥协。丘吉尔表示他与斯大林建立了亲密关系，莫

洛托夫也认为斯大林在会议中与客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现在，三巨头的“家庭圈子”只差罗斯福与斯大林这关键一环了。

1943年9月，斯大林同意了罗斯福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的要求。这一年，英美苏三方关系正经历着深刻变化：在1月14日至24日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向丘吉尔表示自己不同意在战后恢复或维持殖民帝国，并加快构思基于开放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国际新秩序；苏联赢得了7月至8月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德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而苏联在牺牲了近700万名官兵之后终于锻造出了基于“大纵深作战理论”的一流军队；相比之下，作为曾经全球霸主的英国成为三国之中的“实力洼地”，英国外交政策精英开始思考如何才能战后最大限度地保证英国利益。

11月28日，三巨头终于相聚在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三人在会议中没有发生过激烈交锋与争吵，罗斯福谦道：“我们在德黑兰的会议上已经证明，我们可以让各国的理想汇合成一个和谐整体，团结一致地为我们自身和全世界利益而采取行动。”12月6日，《德黑兰宣言》宣布，“我们将戮力同心以赢得战争并共铸和平”。

事实上，三国协奏曲并不完全和谐，美苏协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的让步为基础的。斯大林坚持“霸王”行动必须在1944年春开始。但丘吉尔担心登陆法国作战可能会导致一

墨子的“节用”思想

□ 张子玉 刘大林

崇俭节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价值观念。两千多年前，墨子提出“节用”思想主张，其“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命题潜移默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道德实践。墨子是一位集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时代巨子；墨学是诸子百家中唯一的平民学派。

墨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战乱频仍，诈伪相尚，社会动荡，战争和统治者的奢靡无度使下层百姓遭受了巨大的苦难。统治阶级“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槨，多为衣衾”。墨子针对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社会现实，坚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提出“节用”主张，主旨在“去无用之费”。

民得不劳的平民立场。墨子认为，统治阶级和旧贵族们生活上极端奢侈浪费，加之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造成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浪费。而为政者的奢侈无度，“左右象之”，臣子左右纷纷效仿，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造成了社会的极大不稳定。于是墨子提出“去无用之费”。“去无用之费”可以“用财不费，民得不劳，其兴利多矣”。

兴利除害的道义追求。“兴利除害”，关键是给予百姓物质财富上的利益和实惠。统治阶级在施政时，凡事应该利国利民，而过度的追求衣服、饮食、宫室、舟车、乐器之华丽，不仅耗费钱财、荒废农耕，还会使人耽于荒淫，于国于民都没有利。所以，墨子认为，节用是“天下之大利也”。节用可以使“府库实满，士民不劳”，为天下之利；奢侈浪费的行为是天下之害。为天下“兴利除害”，是墨子和墨家学派学术活动的宗旨和目的，墨子一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用之有度的行为法则。墨子非常重视事物实践中规则、法则的运用。他认为“天下从事者”说话做事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如果“无法可度”，治国理政等都将一事无成。墨子以古圣王的节用之法为法则，提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的节用原则，要求贵族统治者去掉不必要的浪费，一切花费以够用为基准，凡是不能增加国家百姓利益的花费，都要限制和停止。以节用的方针治国，可以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不需要向外夺取土地。根据国家的情况，节省不必要的费用，就可以使财富成倍地增长。墨子提倡的“节”即“适度”，衣食住行的用度要以人的实际需要为限，适当节制，注意分寸，不能过分，超出限度就是奢侈浪费。

裕民富国的固本之道。墨子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为五谷乃国之根本，“固本”是治国的重中之重。民无衣食，自身生存已不可能，更无以供养“为政者”，那么其他的任何事业也就都不可能实现。基于此，墨子认为，财用

不足要反省是否抓住了农时，粮食不足要反省是否注意了节俭。而为政者“厚作敛于百姓”使“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又蓄私使“男女失时”，人口减少。故墨子强调“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而“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认为：“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霸。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所以，墨子强调固本节用。

居安思危的备战意识。墨子“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指出造成国家危亡的七种祸患是轻视城防、外交无能、滥用民力、君主专断、臣下不忠、赏罚不明、国库空虚。只要有这7种情况，国家就会面临灾祸。墨子提出， “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食、兵、城三者是国家战备工作必须具备的工具，而“食”又谓之“国备”，是重中之重。各项物资的储备，是治国的要务，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积累和储备，一旦发生战乱或出现灾荒，那么国家就会面临存亡的危机。“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所以，墨子主张，生产的粮食及物资，不能挥霍无度，要节约用项、加以储备，做到有备无患。墨子又举例说，即使是圣王统治时期，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不出现五谷歉收、水旱无时的灾年，为什么能够“无冻饿之民”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做到了“力时急而自养俭”。平时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节俭，就能够有充足的储备，因而可以待凶饥。有了充足的武备、守备和粮食储备，国家安全就有了根本保障，“国备”完善，意味着上下一心、国富民强，“七患”就会迎刃而解。

鉴古知今的历史思维。墨子非常注重从历史事件和圣王治政经验中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在“三表法”中提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学习前人的经验智慧，以此作为检验政令言论是否合乎真理的标准。墨子举例说，古圣王于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等生活需求，仅求“便于生”“便于身”而已，而当今之主背道而驰，厚作敛于百姓而满足其私欲之奢靡行为，招致天下之乱，“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墨子从而总结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道理，这一命题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千古不变的定则。



另一个方向

根据艾登等人的回忆，与罗斯福和斯大林的热情洋溢不同，德黑兰会议之后的丘吉尔心情低落。但是，丘吉尔有足够的政治谋略在合适的时机抓住美苏同盟关系以及战后秩序设计的弱点，为自己的战略意图和大英帝国的利益争取更大的施展空间。

丘吉尔一开始就捕捉到了同盟关系的根本缺陷：除了推翻德国纳粹之外，同盟国实际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因此，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苏联和英美的分歧将在战后显现出来。罗斯福更没有料想到的是，美国期待的传统帝国的瓦解将造成第三世界的“权力真空”，美苏两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会因此而激化。

罗斯福自己也未想好“四警察”监管国际社会的和平的具体方法。战略支点与《大西洋宪章》中强调的民族自决存在抵触，东欧成为埋入美苏关系的危险“楔子”。虽然，罗斯福同意苏联在东欧保持有利地位，不会在此与斯大林纠缠，但是他也清楚自己很难让美国人接受这一现实。更深层次的冲突是，作为世界最强，美国的理想是在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帝国”，而苏联的不安全感和对地缘空间的执着难以与之兼容。

罗斯福战后设计的最大缺陷或许是他太过依赖于他自己的策略与智慧。与俾斯麦一样，罗斯福具备在多种冲突力量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技艺，因此能够在战时协调美苏英三国的分歧与矛盾。但是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只剩下16个月的时间来实施自己的计划。当他在1945年4月去世时，没有合适的继承人能够扮演与之相同的角色，德黑兰会议关于战后秩序安排的弱点立刻显现出来，并不断放大，而丘吉尔将抓住它们，与杜鲁门一起将历史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二战与国际秩序